

民国时期岱山地区的渔盐社会生态

——以1936年的盐户渔民暴动案为中心

尹玲玲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摘要】多种人文与自然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民国二十五年岱山盐户渔民暴动案的爆发,该案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早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岱山等滨海地区的渔盐社会生态已渐趋紧张。时有“闹粮戕官”案或渔民暴动案,时而又有闽盐、岱盐争端案与海难事件,或又发生盐户组合会风潮。民国八年的岱山奉帮渔民闹盐案,昭示该区的渔盐社会生态逐步恶化。民国二十五年的盐户渔民大暴动,则揭示其社会生态恶化的严重加剧,折射出其时其地之社会生态处于官民严重对立的局面,是社会矛盾与积怨的总爆发。案件之后,不仅在一段时间内仍有余波,并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回响。官民双方均留下深深的阴影,产生既提防又惧怕的心理。官民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敌对的张力,时有风声鹤唳。暴动案在双方之间留下的心结与伤痛,对于整个浙东滨海地区来说,其社会生态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其负面影响也很难较快消歇。

【关键词】岱山;暴动;渔盐经济;渔盐社会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2-0117-09

The Fishery Salt Social Ecology in Daishan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A Study Centered around the Salt Seller and Fishermen Riot in 1936

YIN Ling-ling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uniform acting of multiple social and natural factors led to the Daishan salt seller and fishermen riot in the 25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ase is somewhat a natural catastrophe, but even more the consequence of human actions. As early a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first few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tension in the fishery salt social ecology in coastal regions such as Daishan. There were ‘Anti-government for food’ cases and fishermen riots, and there were salt business friction between Fujian and Daishan, and coastal incidents, and the merging of salt sellers. The Daishan fishermen salt riot in the 8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dicated the gradual escalation of tension in the fishery salt ecology in that area. The fishermen salt seller riot in the 25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vealed the severe worsening of social ecology, and is a reflection of the hostile stat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uthority at that time and place. This was a total outbreak of social tension and conflict. After the incident, things were not just far from over, there were echoes and ripples in all parts of the society. An aftermath was left in both the hearts of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leading to a defensive and fearsome psychology. There goes a hostile tension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and people, with small friction there and then. For the entire East Zhe-

[收稿日期] 2020-01-02

[项目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东地区河湖水系的历史变迁研究”(19BZS109)

[作者简介] 尹玲玲(1973-),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环境史、历史地理。

jiang costal regions, the echoes and heart brake left by the riot within the hearts of both parties, will be of negative consequence difficult to alleviate, leaving the social ecology in a tough state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 Daishan; riot; fishery slat ecology; fishery salt society

民国二十五年(1936)7月13日,浙江岱山的盐户渔民联合三千余人发生空前的大暴动。关于这一暴动案,当时就有专题性研究论文。当代陆续又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相关问题^①。笔者也曾先后撰文讨论这一暴动案的时空特点、渔盐资源的配合与失衡、渔盐税率及其管理等,并浅析官民双方的矛盾与积怨问题^②。该案是这一区域社会矛盾的积累已到临界值的体现,并因特定年份的天气状况这一催化作用而激发。关于案件的起因、经过和善后等问题,官民双方均存不同立场,各执一词,相互矛盾。这些矛盾的说辞反映其社会生态已趋严重恶化。此案对其后浙东滨海地区的渔盐生产和区域开发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环境方面,这一问题都还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本文拟通过透视岱山地区的社会生态,以增进对该区渔盐经济与渔盐社会的了解,并希望这些讨论可有助于深化对整个浙东滨海地区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认识。

一、清末至民国初年的社会生态

渔业与盐业在岱山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是故渔官与盐官均属重要职位。《申报》1900年11月15日版登有《浙省官场纪事》,云“岱山盐局会办一差,现由两浙运宪世振之都转札委候补运副邹分转久敬接办。”^③渔官与盐官的派设与迁转都是该区的重大事情,意味着区域内部各派势力与结构平衡的变动或打破。《申报》1908年4月19日版有《渔盐又须改章》一文,云:“定海岱山等处各渔船所需腌盐课两,向归提标中营兵经收给行,嗣由各渔户邀请绅董出首,具禀运司改归绅办。近来运司又复札令标营仍照向章办理,各渔户因此集议,拟嗣后改归渔业公司经办,以免多所周折,未识运司能允准否。”^④渔盐的管理与渔盐之职均属关键岗位,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提标中营、运司、渔业公司等多方势力的拉锯或迭代变迁。可以说,一直以来,官方对岱山地区渔盐之利的争夺和管控无有松懈,强调“因该乡四面环海,易于走私,最为官销之苦”,然该处“虽设有缉私局督同商人巡缉私盐,而卖私晒私之弊终难尽绝”,故而“经由陈运宪具详抚院,请将岱山置设场官一员。”^⑤

事实上,岱山地区自清末民国之交以来即已表现出极为复杂的社会生态。岱、衢两山孤悬耸峙于海中,产盐极盛。早在清末时岱、衢两地私商盐枭即互通声气,武装走私,官民之间、官商之间时有武装对抗。例如,1878年8月衢山“因闹粮戕官”,官方“带兵五百名,乘元凯轮”前往弹压,兵船“于二十二日开船出镇海口,拟往定海会商进剿事宜。”^⑥又如,岱盐与闽盐之间的利益争端,可谓冲突不断^⑦。不仅海上走私,清末尚有宁波钓船且装载岱盐进入长江流域淮盐地界进行走私,导致“浙淮引界,已被全侵”,甚或

① 马登潮:《浙江省民国盐务档案述评》,《浙江档案》1996年第1期;叶恒:《从岱山惨案看民国浙江地区的盐政》,《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② 尹玲玲:《民国二十五年岱山盐户渔民暴动案的时空特征分析》,《海洋文明研究》(第2辑),中西书局,2017年,第31-37页;《论民国二十五年的岱山盐户渔民暴动案》,《明清史评论》(第2辑),中华书局,2020年,第234-252页。

③ 《浙省官场纪事》,《申报》1900年11月15日第2版。

④ 《渔盐又须改章》,《申报》1908年4月19日第12版。

⑤ 《岱山将设场官》,《申报》1911年10月4日第12版。

⑥ 《衢山续信》,《申报》1878年8月24日第2版。

⑦ 《温郡纪闻》,《申报》1888年11月27日第2版;《永嘉琐录》,《申报》1888年12月27日第3版。

雇洋人、插洋旗，“直上皖鄂”，沿途售卖，致使“鄂省淮引销路极疲，均为岱私侵灌。”^①除走私外，因岱盐品质胜于淮盐，还有一部分岱盐被“援土货改造洋货之例重提重制”，因“旧例凡货自香港出口者，皆以洋货论”，故而英商于“香港地方广收浙江岱盐，运至海参威”，将岱盐改造成洋盐出口海参威^②。

1. 清末的渔民暴动案

又据《申报》1910年7月27日报报道，“宁属岱山镇本届渔汛因细故肇祸，渔民相率暴动，格毙一名”，事后官绅纷纷向上电奏禀告，指认其为土匪，并归咎于董事项某，要求将其下狱彻查究办。但此次暴动案实则另有隐情，故而暴动案之定海渔民向上联合诉冤，各渔户和被格毙渔民家属曾两次向浙江督抚电奏禀告呼吁，请求查办^③。

2. 民国元年的闽盐岱盐争端与海难事件

时至民国初年，不惟政治形势风云激荡，地方上的经济利益格局往往亦因时势与人事而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动。民国元年的闽盐与岱盐争端^④就是时局变动下社会生态变迁的相应表现，据《岱廨贩运闽盐之骇闻》这一标题本身即不难看出其背后的矛盾与张力，存在明显的岱盐与闽盐两方所各自代表的利益^⑤。据《申报》所载往来电文，可知卷入势力之多，从财政部总长及苏、沪都督到苏五属盐政、松盐局长等各级官僚，以及苏五属引商等，可见事涉人物之多、层级之广^⑥。引人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电报等快捷的通讯方式使得这种异地的即时沟通成为可能。然而，有时这种即时通讯却因某些偶然因素的叠加而酿成惨剧。岱山走私盐船得电报后迅即开出，却因大洋山洋面突然风浪大作，其中一艘盐船全船覆没，导致多名人员溺斃^⑦。

3. 紧随其后的盐户组合会风潮

民国初年的江浙盐政制度与管理前后有因革，食盐专卖制度及其销区的划定因时局的动荡而发生一些波动。一些利益方往往攀附政治上正得势之人物，借其政治影响为自己谋求经济上的好处。就在上述廉价闽盐冒充岱盐运沪销售导致严重冲突与海难事故之后，紧接着又发生岱山盐户组合会风潮。盐户组合会风潮是该区社会生态变迁的又一表现，现详录一段如下：

定海县属岱山民人周志刚等设立盐户组合会，以均价平秤为宗旨，叠请都督立案给示，未蒙批准。兹周志刚等偕同上海某会会员俞某等二人来岱，自称为孙前总统黄前留守之特派员，周志刚等预派民团赴埠欢迎，前呵后唱，声威赫濯。一面遍发简章，发起人系林少和等十六人，赞成人系借孙中山黄克强二君名义。七月十三日，在高桥天后宫开会，无知愚民讹传为孙黄二君，争欲一睹为快，纷至沓来，持洋五角各买入场券一纸^⑧。

官方将该盐户组合会定性为非法组织，盐事长王清甫以周某等招摇撞骗，于七月十六日电文禀告都督请求对其严行查办^⑨。

4. 民国八年的渔民暴动案

①《严禁钓船走私示》，《申报》1880年10月28日第2版。

②《续录出使俄国大臣胡考求中国出口土货公文·二曰盐》，《申报》1904年11月12日第2版。

③《定海渔民暴动案联合诉冤》，《申报》1910年7月27日第10版。

④《岱山并未缺盐》，《申报》1912年5月26日第6版。

⑤《岱廨贩运闽盐之骇闻》，《申报》1912年7月5日第6版。

⑥《公电·江苏程都督复电》，《申报》1912年6月6日第2版；《公电·上海陈都督电》，《申报》1912年6月22日第2版，第14128期；《苏都督咨沪都督文——为租界食盐事》，《申报》1912年7月20日第7版；《电查许管带被掳情形》，《申报》1912年7月24日第7版；《私运闽盐案应归浙省主持》，《申报》1913年1月20日第7版。

⑦《岱廨盐船遇险纪闻》，《申报》1912年7月9日第6版；《岱廨盐船遇险续记》，《申报》1912年7月12日第6版。

⑧《岱山盐户之招摇》，《申报》1912年7月20日第6版。

⑨《岱山盐户组合会之不法》，《申报》1912年8月21日第6版。

民国前期,官方又对岱山盐场进行归并^①,并对渔盐税进行整顿^②,因改革举措不够周全平缓,执行上又较为激进,由此造成对社会生态的进一步扰动^③。至民国八年酿成惨案,现将案情详录如下:

岱山奉帮渔民,因盐税问题要求不遂,盐警开枪示威,致相奋斗。渔民中弹死者六人,伤者二十余人。其盐警被棒殴死者一人,小岭墩新设之盐局已举火焚毁。现经县公署会拨警队驰往弹压。闻所毙之盐警一人,姓余,湖南籍。当时由众渔民用刀将该警腹部剖开,将盐纳入,裹以麻绳,投入海中。该镇第十五营缉私营长,亦曾被渔民掳去,经盐警奋勇夺回,未致伤命。渔民方面,以无枪弹,故死伤倍多。两浙缉私米统领得报,于二十七晨乘江天轮由沪抵甬,转乘缉私巡轮前往岱山查办^④。

据引文可知,渔民因盐税问题与盐警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直至发生暴动,双方互有死伤。渔民不仅棒殴税警,更将其处以剖腹填盐并裹绳投海的极端手段。据此并之后的报刊载述可知,岱山地区的社会生态已走向恶化^⑤。发展到民国二十五年,社会生态之恶化则进一步加剧,盐户渔民走向武装暴动以与官方税警相对抗,酿成特大惨案,以下进行详细阐述。

二、暴动案前矛盾的酝酿与发酵

正如当时报刊载述所揭,民国二十五年的暴动案,税警与盐民渔民等在渔业、盐业生产方面所站的立场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所谓“在办理盐务者只求严杜走私、涓滴归公。盐民渔民,则因本身生计所关,设有苛扰,易起怨恶”。这两种对立的立场导致官民双方的矛盾日益积累,乃至走向激化。如前所述,“民国八年间,奉帮渔民,因岱山场为处理渔盐案件未能融洽,亦曾激成暴动。场长遇难,房屋被毁。与今日情形,如出一辙”。而民国二十五年的这次盐运署意欲办理盐场归堆,恐怕盐民未能了解,酿成风潮,“曾令驻定税警五区区长吕梓荫,和平办理,并饬定海岱山各场长广事劝导,以免误会”,但矛盾并未得到化解,而是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更大更严重的惨案^⑥。

1. 矛盾的酝酿

事实上,在暴动案发生前的数月,就已有一系列诱因与先兆。先是岱山盐民呈请分摊借配台州所属玉泉各场所产之盐,但却未能如愿。《时事公报》2月29日刊文云:“定海岱山盐民,闻台属玉泉各廩,呈请借配余、岱食盐。五属廩有即日补收去年未收之四成额盐之说。群相惊喜。近悉该项借盐,两浙盐运使方面,令饬统向余姚借配。岱山盐民,于是大失所望,咸谋挽救之策。……现各板户纷纷请求转恳钧长,一视同仁,毋分彼此,以免岱民向隅,缘同一补收去年未收之四成。应请收回成命,仍照原票余、岱两场分借。准予电饬岱局照放,庶昭公允,迫切代陈,不胜待命之至。”^⑦由此可知,岱山盐民在数月之前已因借配不公等问题向上呈控,与官方之间已有矛盾积累。

据《时事公报》3月25日讯,定海岱山场的五属盐厂,1935年因经济发生困难,无力收盐,经召集盐民、盐董暨厂、场两方,商定了较原价为低的临时价格,约定以旧历年底为止,但一直到3月尚未恢复原

①《甬江通信·归并盐场》,《申报》1916年7月7日第7版。

②《杭州快信》,《申报》1917年12月9日第3版;《宁波·渔盐税之又一整顿法》,《申报》1918年3月7日第7版。

③《知事赴岱晓谕盐户》,《申报》1918年7月21日第7版;《宁波·请免减销岱盐》,《申报》1918年9月13日第7版。

④《宁波·定海渔民闹盐》,《申报》1919年6月30日第7版。

⑤《甬团体为盐民请命电》,《申报》1919年7月30日第11版;《盐务署饬查岱山盐案》,《申报》1919年8月9日第7版;《岱山盐案之善后》,《申报》1919年8月13日第7版。

⑥《定海岱山渔盐民反抗税警大暴动·岱岛渔区盐务概况》,《时事公报》1936年7月16日第1版第2张。

⑦《岱山盐民请分摊借配玉泉各廩额盐》,《时事公报》1936年2月29日第1版第2张。

价,盐民因以损失巨大,于月前派“周凤仙、冯天宝、王孝章、刘光栋四人为代表,莅县请愿,县府当局以其请求正当,即予据情呈请省政府转函飭属恢复原有价额收买,以维盐民生计”,但官方也仅表示“县府昨日奉到指令,已由盐运署令岱山场公署查报核议。”^①至于后来到底如何落实,则不得而知。估计仍是以“查报核议”走程序等为借口千方百计推脱拖延,盐民生计维艰。

2. 矛盾的发酵

与上文相对照的是,《时事公报》的同日同版同张还刊登有《鄞江等十三乡镇举发盐务税警队苛索扰民》一文,题头并称“迭在该乡查缉私盐,勒索罚金,人证确凿”。文中综括为“鄞县第七区鄞江桥它山庙盐警队班长程凤岐,检查张祖日等,开枪恫吓及逮捕乡长一案”。可见,税警队不仅与普通民众之间有矛盾积累,且与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也已积怨甚深,乃至直接开枪恫吓并逮捕乡长。此事激起“该地士绅刘祁尚等电告税警第八区”,税警方面“经派第一分区区长邓赞枢,下乡查勘”,在第七区保甲督导办事处接见各乡镇长官及副官,邓当面允诺说将“报告上峰,严予惩办,请静候以待”,不料邓去后,却“毫无动情”,故而“该区全区十三乡镇长,遂联名呈请鄞县政府法办”。为方便讨论,不妨详列该联名呈控信的具体内容如下:

窃查属区鄞江桥它山庙盐务税警队班长程凤岐、检查主任张祖日等,专藉缉私放私为手段,图达敛财中饱之目的,试观驻扎以来,迄今三月,专扰民间,未缉私贩,即可知其用心之所在。元琮等忝列乡镇长,目击彼辈苛索扰民,地方鸡犬不宁,心所谓危,难安缄默。虽自愧菲材,力未能为地方造幸福,亦当为民众除痛苦。爰特列举罪状,牒陈如左:一、该盐警队搜查民间私盐,事前既不依法会同就地军警机关及乡镇长办理,事后又强欲乡镇长出具证明盐在某家搜获。民正乡乡副不从,该盐警队即开枪恫吓。杖锡乡乡长不从,即带队拘留。二、该盐警搜查民间私盐,不据报告,不着制服,挨村滥行搜查。民有不在家中者,即破扉而入,迨入家内,闭门拒入,翻箱倒篋,肆无忌惮。有民正乡王德镛、王德生、王朱氏等家,可资证明。三、该盐警等,在杖锡乡搜查私盐,黑夜破扉而入,乡民疑为盗匪,相率逃避。事后与之理论,该盐警等不但出言不逊,反敢动手就打。被伤者呼□无门,只好忍痛悔气。并闻该盐警等在某甲长家,曾发生开枪示威,弹穿楼板情事。四、查盐警队照章无处罚之权,乃该班长等,三月以来,在民间搜获之私盐,擅自处罚,不给收据,中饱私囊,侵蚀国课^②。

全区十三乡镇长联名控告,要求将该税警队犯案人员法办。文中罗列了税警队班长和检查主任等借缉私之名,对盐民行敲诈勒索之实,一一牒列他们的四大罪状。盐警队并没有处罚权,却违规向盐民收取多宗罚款,可具体落实的就有六起,且将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与罚款数额一一列出,可谓证据确凿。十三乡镇长认为,该盐警等营私舞弊,骚扰乡里,造成民怨沸腾,已属恶贯满盈,其他还有象“勒索供应,擅收民家食米,及宰杀鸡羊,不给代价,以享口福”等情事,更是“目无法纪,形同土匪”,故而大声疾呼,问说“若不严予惩办,何以儆不法而裕国课?”况且各乡镇正副长官,均为义务公职,却被该盐警等如此非法逮捕,开枪恫吓,莫不人人自危、惴惴不已,联名呈控恳请务必迅即转呈两浙盐务税警第八区以及宁波所属盐引公所,将涉案人员撤职查办,“以伸国法,而安地方”!

税警一方为表明自身立场,在《时事公报》的同日同版同张则刊有《税警区暨盐引所会衔布告查禁冒名骚扰》一文,说是驻姚盐警在便衣佩枪缉私时引起误会。文中强调“近来私枭遍地,私盐充斥,致宁属官销,较前锐减,影响国课,殊非浅鲜”,认为“本区职责(所引销)所在(关),设法补救,不容或缓”,且“本区(所)辖境辽阔,私路歧多,税警不敷堵缉,良非无因,爰经将情报告上峰,准商由宁属盐引,派出稽查,协助查缉送办”。当然,为了回应民众对自己苛索扰民的指控,文中也承认“惟在查缉时,无论税警稽查,

①《运署飭岱山场查覆收盐价额》,《时事公报》1936年3月25日第2版第2张。

②《鄞江等十三乡镇举发盐务税警队苛索扰民》,《时事公报》1936年3月25日第2版第2张。

均各备有正式符号,以资识别。检查民居时,须依正式手续,会同当地军警或乡镇长办理”,然后强调“乃近查有不法之徒,假冒本区(所)名义,到处骚扰,殊堪痛恨。除函请公安机关查拿外,并准民众扭送来区惩办或来所送办。抑指名控告,当即严究,以儆效尤”,再冠冕堂皇地说担心民众“恐未周知,合亟会同布告,希各界民众一体知照”。最后,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一桩扭获三名被认为匪类的持枪者,后经查证乃未佩戴符号的轻税盐警便衣查私一事,用以为对自己苛索扰民指控的辩护^①。

距暴动案事发前仅几日之隔的7月9日,《时事公报》还有关于《定岱山秤放局设立泗礁分驻处管理嵎泗列岛盐务》的报道。报道一方面称颂“定海岱山秤放局长兼场长缪光,莅任以来,整顿盐产,不遗余力,嵎泗列岛,虽不产盐,而每年各帮渔船前来捕鱼者,数以万计。除冰鲜不用盐外,或自至岱衢山购盐腌渍,或由运驳船运往接济,历年如此,商渔均便”,声言“嗣以不肖之徒,每采私盐腌鱼,腌后装运宁沪各埠销售。非但妨碍国课,正式渔户亦受害匪浅”,故而“近年海关稽查綦严,遇有无票咸鲜,辄被扣留”。另一方面,又透露说“此固杜绝走私之一法,惟购用运驳船盐之正式渔户,同样未有引票,往往无法鉴别,故每遭池鱼之殃。用是渔户至岱请求在嵎泗列岛设立分局,俾便商渔者,不一而足”。可见实则不少正规渔民可能往往无辜遭殃,深受其害。岱场局长缪光原以“嵎泗列岛离场窳远,鞭长莫及,且毗连重税食盐区,固早有添设分局以便就近管理之计划,卒因场产尚未归堆,渔盐食盐又无区别,管理如不得法,反资流弊,故几经调查考虑,终未实行”,然而当年渔盐已奉令变色,该列岛食盐已成问题,因此“除一面招商承办食盐店外,并于五月间呈准设立收税秤放分驻处于泗礁,以便管理嵎泗列岛各食盐店,兼解决各正式咸鲜船户无引运之问题”。该报道并强调其“开办不久,成绩斐然”^②。可见岱衢、嵎泗渔盐原有之私利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这应该也是几日后暴动案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

三、矛盾与积怨的总爆发

在上述矛盾的酝酿、累积与发酵下,盐场税警队与地方之间积怨日深,税警队在地方上下完全不得人心,从民众到士绅到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如乡镇长官等都视税警如土匪。余姚的轻税盐巡队,早在暴动案发前一月曾“被人将三盐巡杀害投江”^③。事实上,惨案爆发之前的两天,已显事件前兆:“定海马鞍秤放分局,于本月(七月)十一日傍晚被匪抢劫,并将任龙文、吴汝芳两司秤员及公役姜少安绑架以去。”^④之后的两天内,抢劫案不仅未能告破,被绑人员也尚无任何着落和线索,此前的矛盾和积怨最终以更惨烈的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当时的报刊对此有详尽的、连续的报道,今日读来仍觉惊心动魄。

1. 事变经过的不同说辞

按照《时事公报》1936年7月16日的报道《定海岱山渔盐民反抗税警大暴动》所说,7月13日下午二时半,岱山高亭南峰山、北峰山盐民,会同象山、合山东门帮、台州帮及奉化帮等各帮渔民,聚集三千余人在使基乡东岳宫内开会,拟向岱山场秤放局请愿。此事被驻岱税警第五区三十四分队知悉后,由队长胡不归带同税警十八名前往弹压。税警队伍与前来请愿的盐民、渔民等在使基乡相遇,“因言辞间发生误会,遂起冲突”。按该报道所说,“税警因盐民众多,乃开枪示威,盐民等因见税警开枪,愈形忿怒,致起争斗”。当时就有一名南峰山渔民被税警开枪击毙,这时群情愈见愤怒,“当将税警包围,缴夺枪械。各帮渔民,各往携取自卫枪械,向税警开火抗拒”。驻扎岱山的税警第五区三十四队,共有税警百余名,所佩用的都是甘响木壳枪及大刀等。听到与渔民冲突的消息,税警即全部出动前往援助。盐民与渔民中,除

①《税警区暨盐引所会衔布告查禁冒名骚扰》,《时事公报》1936年3月25日第2版第2张。

②《定岱山秤放局设立泗礁分驻处管理嵎泗列岛盐务》,《时事公报》1936年7月9日第1版第2张。

③《姚盐警又遭毒害》,《申报》1936年7月14日第3张第10页。

④《定秤放局悬赏找寻马鞍被绑员工》,《时事公报》1936年7月24日第2版第2张。

少数渔民携有自卫枪械者外,其余大多徒手,“乃分向五属公廨岱山公安局掳取枪械,声言暂时借用,并可邀鱼行鱼栈,保证归还”。此时岱山区署长兼公安局长杨宝楚以及五属公廨、保卫团等机关闻讯后,本已预先将枪械藏匿起来,并一面由杨区长向盐民、渔民等劝导。但终究由于事态严重,公安局及保卫团也已无法弹压下去,“税警队长胡不归,即在使基乡被盐民渔民等击毙,同时死伤队警十余名,渔民二十余人”^①。

据鄞区赵专员查报该案案情,事变经过叙述非常翔实,还原了事件的许多细节,现详细转述如后。当月十日岱山盐业信用合作社,因盐务机关举办测丈,实行造仓归堆,有妨盐民生计,是以召开会议,讨论不晒盐以为抵制办法。驻地税警队长吕梓荫闻讯后,即前往责问,大兴训斥。盐民怨恨在心。到十二日,有个西区盐民叫黄宝顺的,因违约晒盐,被东区盐民察觉阻止,木匠李阿富在旁闲话,于是被东区盐民拖往东岳宫吊打,由西和乡长费恭斋报请公安局率警营救出险。十三日下午三点来钟,有一名测量员叫刘文星的,与盐民发生口角,也被拖往东岳宫吊打。税警队长胡不归,就派武装队伍,到公安局加派了四名警士,会同一起前往解围。税警随后将刘文星夺回,并抓捕了二名渔民,民众于是尾随喊冤,原本希望释放了事。等到了龙岩泥场,盐民愈益拥挤,要求释放被捕盐民。税警不予理睬,民众愈益纷扰,税警乃向天放枪。盐民见状,尤为愤怒,于是逼近追索。据当时在场公安局警士王培荣、江佐林、萧振邦、卓尧宾等声称,税警恐枪被夺,由胡不归队长向前拿枪一指,盐民略向后退。胡队长倒卧泥堆,不料在队长后面的税警已经开枪,约有二三十响。在前面的班长,误中要害倒地,一个盐民于是上前拟向打倒班长取枪,随即被税警开乱枪打死,击毙盐民赵光信、刘阿来二人,并枪伤陈阿善等。因此激成各帮渔民鸣锣纠集,与盐民混合冲入税警队部,税警不支,退守总局。盐民、渔民数千人,乃由大岭墩进攻岱山场,声势汹汹。居民惧怕祸及自己,相率罢市,秩序大乱。当时秤放局紧闭铁门,盐民渔民群集包围。税警盐巡则由内用枪抵抗。群众赤手迎战,拥入铁窗,前仆后继,死伤不计其数。税警负伤的也多。到晚上十点来钟,盐民渔民,用煤油干柴焚毁秤放局。待到午夜,又毁掉该局后幢。守待局内警员等出外逃避时,又将书记员钱振喜击毙。秤放局长缪光,本藏匿于市民家,化装而出时也被击死。另有两名场警同时罹难。该场盐民及各帮渔民,知已扰下祸端,在十四日早晨,纷纷逃匿。待绥南兵舰赶到,汽笛一鸣,民众狼狈而逃,适值大雷雨,扶老携幼,衣服淋漓,听闻有数名小孩被踩踏致死^②。

然而,在赵专员该篇报道发表的第二天,又另有代表盐场税警一方态度与立场的报道同在《时事公报》见刊,现亦详细转录如下:

有盐业兼营信用合作社人员郑锡琨,及曾犯罪出家为和尚法名心良之张一飞等为主谋,竟在该和尚住脚之资福寺,召集盐民两度会议暴动,于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将工作归途秤放局测量夫刘凤新架至东岳宫,悬梁毒打,经其妻得悉,奔至秤放局报告求救。适缪局长等正在开整理场务会议,闻报即派胡队长率领警士十名,往东岳宫营救,途中即遇群众将该测士捆绑而来。胡队恐暴民误会,即命警士停止前进,单带警士徐励一名,上前劝解,不料盐民五六十人,不由分说,即蜂拥而上,抢夺徐励之木壳枪。徐励正与争持,暴民连开数枪,徐励当场击毙。后面有一警士,见势危急,非发枪难保性命,遂将击毙徐励之暴民开枪击倒,夺回失枪。未几渔盐暴民连合共约三四千人,由四面包围,愈逼愈近,不幸演成空前浩劫。计被害盐务人员共九人,伤三十人,当时因胡队长始终恐事态扩大,严令警士不准乱实弹,故暴民死伤可证者仅一人,伤五人^③。

对照观察其立场与措辞,可见在其笔下,事变经过则全然不同。无论事件起因,亦或过程中双方态

①《定海岱山渔盐民反抗税警大暴动·不服弹压·开始格斗》,《时事公报》1936年7月16日第1版第2张。

②《鄞区赵专员查报岱案详情并设法善后·事变经过》,《时事公报》1936年7月29日第1版第2张。

③《岱案善后拟责成盐民赔偿场局损失·经过》,《时事公报》1936年7月30日第1版第2张。

度,还是死伤对比,均与另一方说法形成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相关的报刊载述尤多,可资比较^①。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

2. 暴动事件升级

时间发展到仅仅一个半小时左右之后的下午四时许,“税警在使基乡败退,盐民、渔民三千余人,由大岭墩冲至东沙角岱山场”。此时全镇商店居户均关门闭户,“不敢出外探望”。东沙角一带秩序大乱,秤放局将铁门紧闭。但盐民、渔民等已将该局包围,“税警盐巡,则由内开枪抵抗。一时枪声劈拍,弹如飞蝗。盐民、渔民图冲入铁窗,前仆后继,因之死伤甚众,税警伤亡亦夥”。到晚间十时许,“渔、盐民用煤油干柴,纵火焚烧,该局前幢被毁后,继续又进攻后幢”。至十四日凌晨二点,“暴民以后幢未易燃烧,故示退让。诱局内警员等出外逃避,实则隐伏局旁”,见该局书记钱甸和以及盐警等寻路往外逃奔,当场就被抓住,“用石块击毙后,复将其腹部剖开,悬尸于东沙角山嘴头,惨酷之状难以笔宣”^②。

3. 封锁海口以追杀场长

渔民、盐民们担心秤放局及税警等出走逃跑,于“十三日晚将海口用渔船封锁,不许船只进出。民船及商轮经过该镇者,但见火光枪声,恐怖难以名状”。至十四日晨四时许,秤放局第二幢也已被焚毁。缴获枪支四五十支,子弹两大箱,全局之职员税警等,除伤亡外,其余均逃避一空。盐民、渔民们因未见场长缪光,恐避匿民家,乃鸣锣呼叫,谓“如有藏匿秤放局职员者,则全家诛戮”。或说“缪局长对于盐民,曾多所周全,此次盐民暴动,对于缪氏,或不致加害,但事为反对食盐归堆及渔盐变色而起,秤放局长,首当其冲,九死一生,殆已绝望”。但实际上当时场长缪光出事时避匿于该镇某士绅家中。该士绅听闻暴民等叫嚣,“恐祸及于己,不敢庇藏。嘱缪氏化装出走”。缪氏当于十四日清晨,“扮作佃工,头戴笠帽,短褐跣足,由后门逃走。场警两名,亦化装佃工,暗藏枪械,随行保护。惟缪局长身躯肥硕,中途即被渔民识破,当被击毙,暴尸途中。场警两名,同罹于难。”^③

综合以上多宗事实,可知惨案爆发之前,已然露出草蛇灰线,伏笔埋藏已久。既有发生于民国八年的前案的远线,又有数月前的一系列近踪,可谓诱因与前兆尽显。

四、余 论

多种人文与自然因素的叠加导致了这一暴动案的爆发,既为天灾,亦是人祸。官民双方不仅事前未能较好沟通,案发后就暴动经过的调查及其善后亦各执一词。这次暴动事件折射出了岱山地区的社会生态处于官民严重对立的局面,反映了其时该区渔盐经济与社会的实况。

岱山地区的渔盐社会生态严重恶化后因天灾激发的这一盐户渔民暴动案,不仅在案件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有余波,并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回响。限于文章篇幅,以下做简要叙述。暴动案经省方派大队税警及保安队水警第二大队前往镇压,事变本“已告救平”,大批暴动渔民分乘渔船百余艘扬帆驶回奉化原籍,几日之后“至大浦口为税警查见,双方开火,税警以机枪扫射,渔民不敌,均四散逃逸”,后经追获渔船五艘,渔民二十余名被解省查办,“由两浙盐运使讯问,根究首要凶犯,从严惩办”,岱山场务

①《岱山渔民暴动真相——增加盐税所激成》,《申报》1936年7月19日第3张第10版;《省商联大会昨闭幕·鱼盐变色案窒碍难行》,《时事公报》1936年7月26日第1版第2张;《沪全浙公会声援岱山场被难盐民》,《时事公报》1936年7月27日第2版第2张;《苏浙两税警局长会勘嵎后过甬赴杭》,《时事公报》1936年7月28日第1版第2张;《检举禁毒专员吴望及谈岱山渔盐民变案症结》,《时事公报》1936年7月28日第1版第2张;《盐务稽核所和平办理岱山盐潮善后》,《申报》1936年7月28日第11版;《岱山渔盐民暴变后盐政上应有之改革》,《时事公报》1936年7月29日第1版第2张;《岱案善后拟责成盐民赔偿场局损失》,《时事公报》1936年7月30日第1版第2张。

②《定海岱山渔盐民反抗税警大暴动·焚烧场署·杀害盐员》,《时事公报》1936年7月16日第1版第2张。

③《定海岱山渔盐民反抗税警大暴动·掳取枪械·击毙场长》,《时事公报》1936年7月16日第1版第2张。

则“特派税警副局长余炳勋代理场长”^①。更有调税警独立营由海州过甬开岱的举措^②，甚至将四省剿匪总部的绥靖会议放在衢山岛上召开^③，讨论进剿散匪办法，可见其震慑之心。

惨案之后的十来天，《时事公报》1936年7月24日第二版第二张刊出《定释放局悬赏找寻马鞍被绑员工》一文，题头称，“获救生还者，每人给赏百元”。如前所述，定海马鞍释放分局于十一日傍晚被匪抢劫，任龙文、吴汝芳两司秤员及公役姜少安被绑架。民众与盐场释放局之间，亦即当地官民之间的矛盾积累已久，积怨已深，民众乃至采取极端方式，以海上劫匪的身份绑架官方人士，并以极为残忍的手段杀人分尸。定海释放总局于是悬赏布告找寻任、吴二人，称“如有确知任、吴两员下落来局报告，因而救获生还者，每员给赏一百；有寻得该两员遗尸，认经明确系正身无讹者，每具给赏二十元”。定海释放局估计是因为惨案爆发，惊惧之余，疲于应付，更无暇应对，故而是在事发之后的十来天才登报悬赏搜寻。没过几天，“公役姜少安尸体已于王家墩海面捞获，尸首支离，头遭戮杀而死。”^④

又，定海沈家门对面的港口名为鲁家峙的地方，渔民、盐民各占其半，盐民平日雇用农民搬运盐泥，向来不给付工资，而是每日给与白盐若干以代工资，“该项白盐，亦称力盐，向不做引纳税，习以为常”。暴动案后仅十来天的7月27日，沈家门镇陈家塘泗湾等地方农民十余人，各带以一日劳力所换得之白盐一担（每担五六十斤不等），被沈家门税警目为私盐，要拘人扣盐，引发纠纷，税警鸣枪示警，“秩序顿逞紊乱，全镇布满恐怖空气”。围在税警队部和商会门口的人数已分别达六七百人以上和四五百人，“形势万分严重”。最后税警答应给农民补发力盐盐引并发还力盐，农民在所提要求得到变通满足后“认为满意，始各散去”^⑤。

暴动案当时之血腥恐怖，官民双方作为当事者，应该都已在心底留下深深的阴影。民众与官方，盐渔民与税警双方之间，尤其后者对前者持明显的既防备又惧怕的心理。防备心理可从上述暴动案后的震压、威慑与缉捕不难窥见，惧怕心理则由上述风声鹤唳可见一斑。此外，可能因暴动发生时，岛上尚无电话铺设，导致官方信息交流与沟通不畅，暴动案后仅十几日的7月30日，一则报讯载云：“定海岱山一岛，地面辽阔，人口稠密，岱东与岱西相距虽只三十里，中隔磨心岭，高出云表，因之交通阻，殊嫌不便”，故而规划迅即铺设乡村电话，并筹资实施，其“完成，可指日而待。”^⑥暴动案后，还有官场上相应的人事变更，可能亦与此案有关。例如，照准渔业管理会秘书主任辞职，遗缺则由省府委派另一人接替充任^⑦。这种人事变更，其中可能牵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势力与人群集团等因素。可见，暴动案不仅对该区的社会生态造成直接影响，还间接影响到民政建设与人事更替等方面。

总之，岱山乃至舟山，甚至整个江浙沿海渔盐经济地区的社会生态将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案件之后被提交法院审理，其审结过程同样一波三折^⑧。可以说，暴动案在民众中的心结与负面影响，即便直到法院具结并最终宣判，都还远未曾消歇。

①《暴动渔民解省》，《申报》1936年7月22日第10版。

②《税警独立营由海州过甬开岱》，《时事公报》1936年8月10日第2版第2张。

③《四省剿匪总部今日在衢绥靖会议讨论进剿散匪办法》，《时事公报》1937年1月6日第1版第2张。

④《定释放局悬赏找寻马鞍被绑员工》，《时事公报》1936年7月24日第2版第2张。

⑤《定海鲁家峙运盐农民力盐被扣引起轩然大波》，《时事公报》1936年7月30日第2版第2张。

⑥《定岱山岛设乡村电话》，《时事公报》1936年7月30日第2版第2张。

⑦《渔管会主任秘书江家楣辞职·张孟强接充》，《时事公报》1937年1月6日第1版第2张。

⑧《岱山暴动案犯杭法院提起公诉》，《申报》1936年10月9日第7版第2张；《岱案就获渔民昨移送杭地法院》，《时事公报》1936年7月26日第1版第2张；《岱山暴动案判决》，《申报》1937年1月19日第9版第3张；《岱山暴动案审结》，《申报》1937年7月15日第9版第3张。